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二編 18

「歌仔冊」中的 臺灣歷史詮釋

以張丙、戴潮春起義事件敘事歌為研究對象(三)

丁鳳珍・著



臺灣歷史與文化

研究
輯刊

二 編

第 18 冊

「歌仔冊」中的臺灣歷史詮釋
——以張丙、戴潮春起義事件敘事歌爲研究對象（第三冊）

丁鳳珍 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歌仔冊」中的臺灣歷史詮釋——以張丙、戴潮春起義事件敘事歌為研究對象（第三冊）／丁鳳珍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3〔民 102〕

目 4+170 面：19×26 公分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 二編：第 18 冊）

ISBN：978-986-322-242-2（精裝）

1. 臺灣文學 2. 說唱文學 3. 文學評論

733.08

102002852

ISBN-978-986-322-242-2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

二 編 第十八冊

ISBN：978-986-322-242-2

「歌仔冊」中的臺灣歷史詮釋

——以張丙、戴潮春起義事件敘事歌為研究對象（第三冊）

作 者 丁鳳珍

總 編 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3 年 3 月

定 價 二編 28 冊（精裝）新臺幣 56,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目 次

第一冊

第一章 緒 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	1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對象	3
第三節 研究文獻回顧	8
第四節 研究目的	14
第五節 研究方法	15
第六節 論文架構	17
第二章 「台灣歌仔」研究的歷史與現況	19
第一節 「台灣歌仔」的名稱與內涵	19
第二節 「台灣歌仔」與台灣說唱	47
第三節 「台灣歌仔」現存文獻及研究現況	57
第三章 「歌仔冊」中的台灣政治敘事歌及其研究	99
第一節 清領時期的台灣政治史敘事歌	99
第二節 日治時期的台灣歷史敘事歌	101
第三節 中華民國統治時期的台灣政治史敘事歌	107

第四節 「台灣史詩」類型的台灣政治史敘事歌	108
第四章 張丙武裝抗清事件與《新刊台灣陳辦歌》	
內容解析	115
第一節 統治論述中的張丙武裝抗清事件	116
第二節 《新刊臺灣陳辦歌》版本比較與文字校對	133
第三節 《新刊臺灣陳辦歌》的內容解析	144
第二冊	
第五章 《新刊台灣陳辦歌》的歷史詮釋	161
第一節 《新刊臺灣陳辦歌》對起義者的詮釋	161
第二節 《新刊臺灣陳辦歌》對客家人的詮釋	180
第三節 《新刊臺灣陳辦歌》對官兵的詮釋	184
第四節 《新刊臺灣陳辦歌》對義民、民壯的詮釋	194
第五節 《新刊臺灣陳辦歌》對百姓的詮釋	199
第六節 小結	204
第六章 戴潮春起義事件與《辛酉一歌詩》內容解	
析	207
第一節 統治論述中的戴潮春起義事件	207
第二節 《辛酉一歌詩》的版本與研究	231
第三節 《辛酉一歌詩》的內容解析	235
第七章 《相龍年一歌詩》文字校對與內容解析	303
第一節 《相龍年一歌詩》的文字校注	306
第二節 《相龍年一歌詩》的內容解析	321
第三冊	
第八章 《辛酉一歌詩》與《相龍年一歌詩》的歷	
史詮釋	357
第一節 《辛酉一歌詩》與《相龍年一歌詩》的比	
較	358
第二節 《辛酉一歌詩》與《相龍年一歌詩》對戴	
軍人物的詮釋	361
第三節 《辛酉一歌詩》與《相龍年一歌詩》對官	
兵的詮釋	404

第四節	《辛酉一歌詩》與《相龍年一歌詩》對「義民」、「台勇」的詮釋	441
第五節	《辛酉一歌詩》與《相龍年一歌詩》對無辜百姓的詮釋	451
第六節	小結	457
第九章	《台灣陳辦歌》、《辛酉一歌詩》與《相龍年一歌詩》的歷史詮釋與文學特色	461
第一節	台灣庶民的歷史觀 V.S.清國統治者的歷史觀	461
第二節	台灣庶民的「土著化」V.S.台灣知識份子的「內地化」	482
第三節	「歌仔冊」的文學特色	486
第十章	結 論	497
	參考資料	501

下 冊

附錄一	台語文字及音標轉換對照表	527
附錄二	清領時期台灣漢人起義事件敘事歌	531
附錄三	清領時期台灣漢人起義事件敘事歌唱本——「歌仔冊」書影	585
附錄四	「歌仔冊」中的台灣敘事歌作品清單與收藏地點	647
附錄五	「歌仔冊」相關大事年表	667
附錄六	相關台灣歷史表格	735
附錄七	相關台灣地圖	745
附錄八	台灣客語「歌子」《新編戴萬生作反歌》（連慧珠重新打字版）	777

「歌仔冊」中的臺灣歷史詮釋
——以張丙、戴潮春起義事件敘事歌爲研究對象
(第三冊)

丁鳳珍 著

第八章 《辛酉一歌詩》與《相龍年一歌詩》的歷史詮釋

臺灣有史以來歷時最久的民變——「戴潮春起義事件」，從 1862 年 3 月起事到 1865 年間，歷時三年以上。本章仍以台語歌仔冊《辛酉一歌詩》（又名：天地會的紅旗反、戴萬生反清歌）、《相龍年一歌詩》為研究主要對象。先將歌中的人物依立場予以分類，接著討論《辛酉一歌詩》、《相龍年一歌詩》對此一事件的論述重點與詮釋立場。並以以統治論述中對相關人事的論述做為比較，以此來證明這兩首歌謠獨特的價值。

統治論述包含《大清穆宗毅皇帝實錄》與清國官員奏摺與文書、林豪《東瀛紀事》（1870）、吳德功《戴案紀略》（1894）、蔡青筠《戴案紀略》（1923）、陳肇興《咄咄吟》（1862～1863）、林占梅《潛園琴餘草》、吳子光《一肚皮集》（1875）。

最後再以客語的《新編戴萬生作反歌》〔註 1〕加以比較，以見其歷史詮釋觀點的異同。《新編戴萬生作反歌》，七字一句，每行三句，字數在 7800 字以上，收錄於連慧珠 1995 年完成的碩士論文《「萬生反」——十九世紀後期臺灣民間文化之歷史觀察》〔註 2〕，據連慧珠所述，這首歌是站在客家義民的立場來演唱「戴潮春事件」。筆者從歌詞中的遣詞用字，判斷《新編戴萬生作反

〔註 1〕 天賜（重抄 1915）、洪敏麟（藏）《新編戴萬生作反歌》，連慧珠，《「萬生反」——十九世紀後期臺灣民間文化之歷史觀察》（台中：東海大學歷史系碩士論文，1995.6），pp.141～155。

〔註 2〕 連慧珠《「萬生反」——十九世紀後期臺灣民間文化之歷史觀察》（台中：東海大學歷史系碩士論文，1995.6）。

歌》是一首客語的長篇敘事歌。其中有一些詞彙是客語專有的，如：「臺灣原『係』龜蛇形」、「三位算來『係大哥』」、「縮『轉』呂朗『大火房』」、「『景景』收兵入內山」、「『後生』〔註3〕貪才做民壯」、「皆因打死有『悍多』」、「作反一案『分奔其』」、「『上』埔寮下未前破」、「人馬出到『伯公』〔註4〕下」，諸如此類的用字遣詞，不但像似臺灣客家話，更與臺灣 Holo 話不相同。

第一節 《辛酉一歌詩》與《相龍年一歌詩》的比較

以 1862~1865 年發生的「戴潮春事件」有兩種歌仔版本，一是《辛酉一歌詩》（又名：天地會的紅旗反、戴萬生反清歌），約在 1925 年由楊清池彈唱，賴和將之記錄為文字，1936 年楊守愚整理發表在《臺灣新文學》雜誌〔註5〕，這個版本是《辛酉一歌詩》最原始的刊本；二是高雄縣田寮鄉曾乾舜先生的父親的毛筆手抄本，無歌名，此以第一句歌詞名之為《相龍年一歌詩》〔註6〕，為目前僅見的抄本。

一、《辛酉一歌詩》與《相龍年一歌詩》的形式比較

從句型來看，《相龍年一歌詩》的句型與傳統歌仔冊不同，不是採用七字一句的「七字仔」；而是與《辛酉一歌詩》一樣，採用句型長短不一的雜言體。《辛酉一歌詩》是將藝人楊清池彈唱的唱詞，以文字記錄保存，由此可以確知這是一首歌仔；而，《相龍年一歌詩》由於文字抄寫者沒有說明來源，而且已經抄錄者已經去世，因此無法確知其實際演唱的方式，可以確知的是這首「歌仔」的抄寫年代為臺灣日治時期〔註7〕。遺憾的是，這首歌仔的只留下文

〔註3〕臺灣客語稱年輕人為「後生」。

〔註4〕臺灣客語稱土地公為「伯公」。

〔註5〕楊清池（演唱）、賴和（記錄）、楊守愚（潤稿，1936）《辛酉一歌詩》（又名：天地會底紅旗反）（一）（二）（三），《臺灣新文學》（台中：臺灣新文學社，（一）：1936.9.19，v1n8，pp.125~132，（二）：1936.11.5，v1n9，pp.63~72，（三）：1936.12.28，v2n1，pp.63~67）。

〔註6〕曾乾舜先生的父親（手抄）《相龍年一歌詩》（原歌無題目，此以該歌首句為題目），毛筆手抄本歌仔冊，高雄縣田寮鄉西德村蛇仔穴，日治時期，共 25 頁。（蔡承維先生提供影本）

〔註7〕據筆者電話訪問搜集到此一歌詩的蔡承維先生，他指出曾乾舜先生的父親在臺灣日治時期抄寫這一首歌詩。（2004.10.22）

字記錄，沒有留下樂譜，無法進一步了解其音樂演出型式。

連橫在 1933 年左右指出當時有盲女彈唱「戴萬生」〔註 8〕，由於連橫的母語是臺灣 Holo 話，他所聽到的「戴萬生」，與《相龍年一歌詩》、《辛酉一歌詩》應有很大的關聯。

就地域來講，《辛酉一歌詩》採集於臺灣中部的彰化縣，而《相龍年一歌詩》則來自於臺灣南部的高雄縣；就文字記錄時間來看，都在臺灣日治時期被記載〔註 9〕。施師炳華與筆者懷疑這兩首「歌仔」有一個共同的母本根源，後來在不同地域傳唱演出，促使這兩首「歌仔」後半段的內容有所不同；同時，這一「歌仔」也可能成為戲劇的戲文來源，因此，《相龍年一歌詩》中才會出現「只牌、丑、旦」、「丑白、旦白、不盡白」這類的文字。如果《相龍年一歌詩》與《辛酉一歌詩》有一個共同的母本，那麼，筆者從這兩首「歌仔」的內容有很多與歷史事件相吻合的情形看來，其創作時代應在清領時期，在同治 4 年（1865）戴潮春事件大致被平定之後，由民間藝人創作。

二、《辛酉一歌詩》與《相龍年一歌詩》的情節大綱比較

從內容來看，《相龍年一歌詩》與《辛酉一歌詩》這兩首歌仔的起頭都一樣，都是從「孔道台」因為欠缺軍餉，而剝削臺灣府城商民的錢，繼而遭受百姓的罷市抗爭寫起。《相龍年一歌詩》只寫到 1862 年戴潮春等人殺了貪官孔道台；《辛酉一歌詩》則寫到 1864 年林文察回福建協助勦討太平天國為止，篇幅較長。

《辛酉一歌詩》的字數在 7000 字左右，《相龍年一歌詩》的字數將近 3700 字。《相龍年一歌詩》的前半段的情節與《辛酉一歌詩》的情節十分類似，都花了很長的篇幅敘述 1861 年臺灣道台孔昭慈因為欠餉而向百姓課稅，因而招致臺灣府城商民反抗的過程，以此作為戴潮春武裝反抗政府的序曲。

〔註 8〕 見連橫《雅言》：「台南有盲女者，挾一月琴，沿街賣唱；其所唱者，為『昭君和番』、『英臺留學』、『五娘投荔』，大多男女悲歡離合之事。又有采拾臺灣故事，編為歌辭者，如『戴萬生』、『陳守娘』及『民主國』，則西洋之史詩也。」（台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 166 種，1963.2，p.36。）（《連雅堂先生全集：臺灣語典 雅言》，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3。）

〔註 9〕 1936 年楊守愚將賴和（筆名「懶雲」）約十年前（1926 年左右）所記錄的《辛酉一歌詩》重新整理，分三期發表在《臺灣新文學》（台中：臺灣新文學社，（一）：1936.9.19，v1n8，pp.125～132，（二）：1936.11.5，v1n9，pp.63～72，（三）：1936.12.28，v2n1，pp.63～67）。

此外，兩首歌都有描寫同治 1 年（1862）3 月戴軍進攻彰化城的情節，到此，《相龍年一歌詩》就結束了；而《辛酉一歌詩》則進一步描寫到同治 3 年（1864）福建陸路提督林文察率領台勇前往漳州與太平天國軍隊作戰為止。

兩首「歌仔」的內容大要如下表：

《辛酉一歌詩》	《相龍年一歌詩》
1. 辛酉年（咸豐 11 年，1861 年）台南府城百姓罷市抗稅（約 900 字）	1. 辛酉年（咸豐 11 年，1861 年）台南府城百姓罷市抗稅（近 1800 字）
2. 孔道台前往彰化縣，天地會眾攻城戕官（約 2000 字）	2. 台南府城郊商請出戴潮春來推翻政府，進攻彰化城（近 1700 字）
3. 臺灣鎮總兵林向榮，出兵平亂，死於斗六（約 2700 字）	3. 結尾：戴潮春收兵，解散武裝部隊，勸兄弟各自營生（約 90 字）
4. 清廷派兵來台，戴軍失敗，戴潮春被殺（約 1400 字）	
5. 尾聲：勸人不要謀反（近 200 字）	

《辛酉一歌詩》的情節，除了敘述 1861 年臺灣府城商民反抗孔道台的情節之外，其它的情節與人名、地名與林豪《東瀛紀事》、吳德功《戴案紀略》及蔡青筠《戴案紀略》有很大的相似性，可見不是歌者憑空捏造出來的歌詞。至於，《相龍年一歌詩》描寫鳳山縣民響應戴軍的情形，則未見於其它史料記載。

三、《辛酉一歌詩》與《相龍年一歌詩》的地理空間與人物比較

在地理空間上，《辛酉一歌詩》所描寫的地點與《相龍年一歌詩》有同有異。兩首歌都是從臺灣府城開場，隨後描寫到彰化縣城；此外，《相龍年一歌詩》描寫了很多鳳山縣的地名，而《辛酉一歌詩》則沒有寫到鳳山縣；《辛酉一歌詩》還描寫到嘉義縣境（嘉義縣城、斗六門、布袋嘴）、彰化縣境（大墩、四塊厝、小埔心）、淡水廳（大甲）等地，這些都是《相龍年一歌詩》沒有提及的地點。

在人物角色上，《辛酉一歌詩》所描寫的人物遠多於《相龍年一歌詩》，兩首歌的人物有同有異。《辛酉一歌詩》的人物多見載於其它史料，而《相龍年一歌詩》的許多人物則未見於史料，特別是鳳山縣加入戴軍的眾多大哥。

據林豪記載：「戴逆以首禍故為黨所附，然皆烏合之眾，緩急不足恃。而

戇虎晟、啞狗弄宗族強盛，獷悍習戰，戴逆內憚之。」〔註10〕謝國興在《官逼民反——清代臺灣三大民變》書中以「豪強並距的時代」做為戴潮春事件的標題，並指出：「戴案的特色之一是，主要領導人或主要股首多屬強宗大族，不像朱一貴及林爽文事件時游民或羅漢腳構成主要幹部。」〔註11〕

在《辛酉一歌詩》中，戴潮春所佔的篇幅並不會比林晟、陳弄、呂梓來得多，這反映了戴潮春在戴案中所扮演的角色。不過，在《相龍年一歌詩》中，戴潮春被極度英雄化，成為戴案中最佳男主角、唯一的大哥。

第二節 《辛酉一歌詩》與《相龍年一歌詩》對戴軍人物的詮釋

在《辛酉一歌詩》中反抗政府的人物眾多，敘述最多的人物是：戴潮春、恁虎晟（林晟、林日成）、啞口弄（陳弄）、呂仔主（呂梓）；其次是：啞口弄（陳弄）、王仔萬（王萬）、吳仔墻（吳墻、吳志高）、黃豬哥、張三顯、嚴辨、洪仔花（洪花）；女將的篇幅雖不多，但是卻很勇猛。

在《相龍年一歌詩》中反抗政府的人物雖然也不少，但是對於個人的敘述，則多集中在戴潮春，其他的個別人物都只是簡單帶過；對集體人物：眾百姓、五大姓、三郊頭、平埔番等的反抗行為則有生動的敘述。

一、對反抗政府的人物之論述

（一）戴潮春（？～1863）

戴潮春，字萬生，彰化縣凍東堡四張犁（在今台中市北屯區）人，原籍福建省漳州府龍溪縣。家境富裕，世為北路協稿識。咸豐11年（1861）冬季，北路協副將夏汝賢向戴潮春索賄不成，便將戴潮春世襲的武職（北路協稿書）革去。〔註12〕

1. 《辛酉一歌詩》與《相龍年一歌詩》中的「大哥戴萬生」

在《辛酉一歌詩》與《相龍年一歌詩》中，戴潮春都被認定是反抗陣營

〔註10〕詳見林豪《東瀛紀事》，p.8。

〔註11〕見謝國興《官逼民反——清代臺灣三大民變》（台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93.3），p.111。

〔註12〕詳見林豪《東瀛紀事》卷上〈戴逆倡亂〉，pp.1～3。

中的首領。在《辛酉一歌詩》中，戴潮春雖是帶頭大哥，但是光彩與戲份卻與其他幾位大哥差不多。歌中對他的稱謂詞，也沒有特別之處，他和其他大哥都被稱為「大哥」。如：「大會招來小百千，要扶大哥戴萬生」，不過，在大多數時候，歌者都直接稱他為「戴萬生」，而沒有加上「大哥」二字，如他被捉之後：「大小曾做事有仔細，令了丁太爺押了戴萬生」。

在《相龍年一歌詩》中，戴潮春除了被稱為「大哥」，還有一次被稱為「戴萬歲」，這是臺灣府城三郊董事派人去送謀反密函時，他們對戴潮春的敬稱。在整首歌的敘述中，歌者大多數多直接稱他「戴萬生」，沒有加上「大哥」二字，不過有特別提及他是「元帥」。

除了以上的尊稱，戴潮春在《辛酉一歌詩》中有一次被稱為「臭小弟」，這是歌者模擬臺灣道台孔昭慈罵戴潮春的話：「戴萬生這個臭小弟，招那天地會，就是謀反的代誌。」這是官方的觀點；但是除此句之外，未再對戴潮春有此稱呼，可見歌者認同的是民間的稱法：「大哥」。

據羅士傑研究：「在所謂的戴潮春之亂中，戴本人並未擁有決定性的影響力，這樣的見解官方與民間的相差不多。」〔註13〕

《辛酉一歌詩》中對戴潮春的論述重點如下：首先，以百性招眾成立天地會，然後由大家「扶大哥戴萬生」做為首領，而不是戴潮春主動要組織天地會。接著因為林晟殺死秋日觀等官員，天地會眾趁機擴大地盤，戴潮春無意中看到，才說：「這就巧這就奇！我也無通批，頂下縣四散擺總是紅旗。該是我戴潮春的天年！」顯然，戴潮春不但不是這次事件的主導者，更是後知後覺，想撿現成便宜的領袖位置來坐。在描寫進攻彰化縣城時，對戴潮春的描寫也很少。隨後，簡單敘述他攻大甲，可惜是他手下的大哥人雖多，卻能力不足，無法攻下大甲。之後，戴潮春的敘述跳到他被張三顯捉去送官，最後被凌遲而死。歌中對戴潮春的死只有兩三句，完全看不出他的英雄氣概。

但是，在《相龍年一歌詩》中，戴潮春充滿英雄式的言行舉止。首先，指出戴潮春之所以率眾反抗政府，來自於他的見義勇為；也就是臺灣府城的三郊頭家寫密函去向他求助，並稱他為「戴萬歲」，他才進一步豎旗聚眾，組織天地會。在這首歌中，戴潮春雖是先被動求助，但他隨即主動招募天地會眾，歌中反覆描寫許多大哥級人物積極響應戴潮春的號召，率眾前往戴營會

〔註13〕 見羅士傑〈試探清代漢人地方菁英與地方社會——以同治年間戴潮春事件為中心〉，《臺灣史蹟》n38（南投：中華民國臺灣史蹟研究中心，2001.6），p.146。

合，並稱他為「元帥」。隨後，描寫戴潮春斬殺臺灣道台孔道台和周衣申，「眾人暢心甲歡喜」，戴潮春等於是為民眾報仇的大英雄。百姓的仇恨報了之後，戴潮春便解散部眾，鼓勵大家當一個自力更生的良民，展現他不戀棧權位與不迷信暴力的氣度。故事就此結束。這樣的戴潮春，與其它史料所記載的貪戀權位、死於戰場的戴潮春形象截然不同。

2. 統治論述中的「逆首」戴潮春

(1) 《大清穆宗毅皇帝實錄》與清國官員奏摺與文書

不同於《辛酉一歌詩》與《相龍年一歌詩》的「大哥」、「元帥」；在清國官方的文獻中，戴潮春被稱為「匪徒」、「匪首」、「逆首」、「戴逆」、「首逆」、「賊首」。

在《大清穆宗毅皇帝實錄》中，清穆宗諭中論及戴潮春的字句都指稱戴潮春為反抗軍的首領，皇帝對他下追殺令。舉例如下：「臺灣彰化縣匪徒戴萬生等聚眾滋事」（同治1年5月4日）；「逆首戴萬生距守縣城」（同治1年7月10日）；「逆首戴萬生遁入番社」（同治2年3月16日）；「首逆戴萬生已竄回四張犁本莊」，「將戴逆巢穴焚毀」，「務將戴逆擒獲，毋任漏網」（同治2年4月22日）；「並飭凌定國等迅拔斗六，殲擒戴逆」（同治2年11月22日）；「迅將賊首戴萬生斬擒，毋令兔脫」（同治2年12月24日）；「惟首匪戴萬生現在逃往彰化」（同治2年12月29日）；「以福建臺灣生擒首逆戴萬生，賞守備徐榮生等花翎」（同治3年1月27日）。〔註14〕

以下再看官員的奏摺與文書對戴潮春的論述。

同治1年（1862）4月24日閩浙總督慶瑞〈奏為臺灣彰化縣轄會匪滋事遴委大員馳赴督勸恭摺〉：「臺灣彰化縣轄有匪徒戴萬生倡立添弟會名目，煽惑多人，肆行搶掠，當經密飭臺灣鎮道查拏解散。」「匪首戴萬生結會滋事」〔註15〕這是清穆宗收到關於戴案報告的第一份奏摺，慶瑞指出戴潮春所組的會是「添弟會」，他煽動誘惑百姓加入，結夥搶劫；但是這樣的敘述顯然是土匪強盜的行徑，卻還不足以構成造反的事實。

丁日健在同治2年（1863）年8月4日接任臺灣道台，他稱戴潮春為「戴

〔註14〕詳見《大清穆宗毅皇帝實錄》（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清穆宗實錄選輯》，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印行，1997.6.30，pp.19～20、26、43、45、46、56～58）。

〔註15〕見《清宮月摺檔臺灣史料（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代臺灣文獻叢編，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出版，1994.10），p.442。

逆」、「逆賊」、「逆首」、「首逆」、「偽東王」，指出戴潮春等人「倡亂」，「戕官陷城，任意鴟張，荼毒我生靈，佔踞我城邑；實為天地所不容，王法所難宥」。

〔註 16〕在丁日健的奏摺文書中，大多數都是在報告他與官兵節節勝戰的詳情，他在同治 3 年（1864）春〈稟撫軍徐中丞樹人〉中指出，同治 2 年（1863）12 月 18 日他親自督師，戴潮春隨即被官兵生擒，他和曾元福在寶斗大營訊問後，將戴潮春凌遲處死。諸如此類的敘述，讓丁日健成為真正的英雄，戴潮春則成為罪大惡極的逆賊。

（2）林豪《東瀛紀事》（1870）、吳德功《戴案紀略》（1894）、蔡青筠《戴案紀略》（1923）

林豪（1831～1918）《東瀛紀事》有〈戴逆倡亂〉與〈逆首戴潮春伏誅〉兩節，他稱戴潮春為「戴逆」、「逆首」，指出戴潮春組天地會「倡亂」，「所言皆悖亂之事」；並批判戴潮春很狡滑，沒有實力，「外強中甘，虎威難久假」；並嘲笑他貪生怕死而投降官兵，比不上林晟、陳弄、「諸逆婦」等人能夠勇敢面對死亡。但是，林豪指出戴潮春只所以會判亂，導火線在於前北路協副將夏汝賢，他向戴潮春索賄沒有成功，竟然革去戴潮春世襲的武職，才會導致戴潮春心生不軌。林豪記錄丁日健訊問時，戴潮春將過失獨攬在自己身上，說明他的行為是被官府所逼，並百姓脫罪。〔註 17〕

吳德功（1850～1924）的《戴案紀略》有時稱戴潮春為「戴逆」，但是更常直接稱他為「戴潮春」、「潮春」，也指出戴潮春的行為是「結會作亂」。〔註 18〕內容雖比林豪《東瀛紀事》稍多，但是大致與林豪所記一樣。對於戴潮春的組天地會，吳德功認為戴潮春的用意在於：「陽以保身家為名，實陰以拒夏汝賢之索賄。」但是其成員卻龍蛇混雜，吳德功指出戴潮春不知解散會黨，還放任會眾，最後必定走向造反一途。〔註 19〕此外，吳德功批判戴潮春「庸懦無能」〔註 20〕，不懂作戰，身邊又沒有敢戰的手下，戴潮春只所以能成為

〔註 16〕詳見丁日健《治台必告錄》（下）（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印行，1997.6.30，pp.424、426、432、441、446～449、451～452、462、470、477、492、497、570、572、592）。

〔註 17〕詳見林豪《東瀛紀事》，pp.1～3、44～46。

〔註 18〕詳見《吳德功先生全集：施案紀略、戴案紀略、讓台記》（南投：臺灣省文獻會，1992.5.31），pp.3～9。

〔註 19〕見《吳德功先生全集：施案紀略、戴案紀略、讓台記》（南投：臺灣省文獻會，1992.5.31），p.4。

〔註 20〕見《吳德功先生全集：施案紀略、戴案紀略、讓台記》（南投：臺灣省文獻會，

逆首，是因為他到處「鼓動豪猾，逢人以將軍相贈」，最重要的原因是天意如此。〔註21〕

蔡青筠（1868～1927）的《戴案紀略》指出戴潮春小名「戴萬星」，在論述中有時稱他為「戴潮春」、「潮春」，有時稱「戴逆」，也認為戴潮春的行爲是「結會作亂」。〔註22〕書中所記史事與林豪、吳德功的記載大同小異。書中對戴潮春有以下評語：「嘗聞之先輩，言戴逆雖略有識字，然儒柔不斷。」〔註23〕

（3）陳肇興《咄咄吟》（1862～1863）、林占梅《潛園琴餘草》、吳子光《一肚皮集》（1875）

以下討論文學作品中的戴潮春形象，以與《辛酉一歌詩》與《相龍年一歌詩》作一比較。

彰化縣舉人陳肇興（1831～1876 後）〔註24〕於 1862～1863 年間所寫的一系列詠史詩〈咄咄吟〉〔註25〕，其內容記載陳肇興遭遇戴潮春事件的經歷與看法。詩句中，沒有特別描寫戴潮春個人，不過，在〈殉難三烈詩〉的序中，也稱戴潮春為「戴逆」〔註26〕，詩中另有「賊王」一詞，應當也是指戴潮春。〔註27〕

淡水廳竹塹團練首領林占梅（1821～1868）的詩集《潛園琴餘草》，也有論及戴潮春事件，特別是組詩〈南征八詠〉。在林占梅的詩中對戴潮春個人並無進一步的吟詠，只是提到戴潮春時，稱他為「戴逆」、「戴匪」。〔註28〕

1992.5.31），p.56。

〔註21〕 見《吳德功先生全集：施案紀略、戴案紀略、讓台記》（南投：臺灣省文獻會，1992.5.31），p.18。

〔註22〕 詳見蔡青筠《戴案紀略》（臺灣文獻叢刊第206種，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台北：臺灣銀行/發行，1964.11），pp.1、3～6、11、15、18～20、24、52～54、58、60）。

〔註23〕 見蔡青筠《戴案紀略》（臺灣文獻叢刊第206種，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台北：臺灣銀行/發行，1964.11），p.51。

〔註24〕 陳肇興的生卒年採用林翠鳳的說法，詳見：林翠鳳《陳肇興及其《陶村詩稿》之研究》（台中：弘祥出版社/發行，1999.8），pp.4～5。

〔註25〕 見陳肇興《咄咄吟》卷七、卷八，《陶村詩稿》（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印行，1978.6），pp.91～138。

〔註26〕 見陳肇興《咄咄吟》卷七、卷八，《陶村詩稿》（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印行，1978.6），p.124。

〔註27〕 見陳肇興《咄咄吟》卷七、卷八，《陶村詩稿》（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印行，1978.6），pp.107、112。

〔註28〕 見林占梅《潛園琴餘草簡編》（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文獻叢刊第202

廣東文人吳子光（1819～1883）在戴潮春事件時，正好來臺灣遊歷，避難在淡水廳，在他的著作《一肚皮集》（1875 自印）中，有少數篇章提及戴潮春事件，特別是他於戴潮春事件後不久所寫的〈奉旨建坊入祀昭忠祠贈忠信校尉羅公傳〉〔註 29〕。吳子光的著作中對戴潮春個人的描寫很少，提到戴潮春時，稱他為「彰邑奸胥戴萬生」、「戴逆井底蛙」、「戴逆」、「戴逆」，指出他的行為是「作亂」、「叛」亂。〔註 30〕吳子光指出戴潮春「借團練為名，拜盟聚黨，橫行鄉里間，人皆側目視，然無敢撓其鋒者。」〔註 31〕在吳子光筆下的戴潮春形象，與林豪、吳德功、蔡青筠所說的懦弱無能的戴潮春有所不同；吳子光可能是為了強調義首羅冠英的英勇，所以將他的敵人戴潮春形容得比較強悍；吳子光並進一步指出戴潮春曾經想要封「偽官」給羅冠英，但羅冠英以不可能作「賊」來回絕。〔註 32〕

3. 《新編戴萬生作反歌》中的戴萬生

《新編戴萬生作反歌》的題目明確指出「戴萬生」「作反」，在歌中眾多人物中，作者選擇戴潮春作為題目，可見戴潮春是最關鍵的人物。歌中指出戴潮春本是「老曾」（曾玉明，臺灣鎮總兵）的「螟蛉子」（義子）。歌中先介紹戴潮春的祖父在官府任職，由於戴家「姓少丁弱」，於是田園屋地被霸佔，雖然作者沒有指出是被誰霸佔，但是從歌詞的情節看來，應當就是阿罩霧「林天河」（林奠國）；作者指出：戴潮春之所以會組會黨的原因，是為了保衛家園。也因此，林天河懼怕戴潮春勢力壯大，因此寫信給在唐山（清國內地）的「林友利」（林有理之誤寫，就是林文察），林文察於是賄賂「休總兵」（疑為總兵林向榮之誤寫）來臺灣剿辦戴潮春。

種，1964.11），pp.132、141。

〔註 29〕 吳子光〈奉旨建坊入祀昭忠祠贈忠信校尉羅公傳〉收在吳子光《一肚皮集》（卷四傳上，本書依據 1875 年吳氏雙峰草堂自刊本翻印，臺灣先賢詩文集彙刊第三輯 2，龍文出版社/印行，1997.6.30），第二冊 pp.258～267。後又被收錄於吳子光《臺灣遊記》（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文獻叢刊第 36 種，1959.2），pp.51～54。

〔註 30〕 見吳子光《臺灣遊記》（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文獻叢刊第 36 種，1959.2），pp.24、51～54、56、58、111、115。

〔註 31〕 見吳子光《臺灣遊記》（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文獻叢刊第 36 種，1959.2），p.51。

〔註 32〕 見吳子光《臺灣遊記》（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文獻叢刊第 36 種，1959.2），p.52。